

三里湾，三里湾，/对着水，靠着山，/青枝绿叶上下滩，/自从有了农业社，/有情人，成亲眷，/花好月又圆。

2018年10月29日，我有幸和日本和光大学表现部教授、(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加藤三由纪姐姐，在长治市赵树理研究会杨宏伟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长治平顺县三里湾村(更名前为“川底村”)。《三里湾》是上个世纪50年代祖父创作的一部讴歌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生动反映农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巨大变化的文学作品。小说问世后多次再版，并被改编为《花好月圆》影片在全国放映，获得热烈社会反响。平顺县川底村就是祖父创作这一长篇小说的原型村之一，后来更名为三里湾村。

车到站早有西沟驾校的秦泰斌副校长在此等候，随着他的引导我们来到了祖父当年创作《三里湾》的旧址，一处偏僻的位于半山腰的农家院落，门上挂着著名板画家同时也是我祖父亲家的郝力群先生1995年题写的“赵树理创作三里湾的住所”匾牌，笔迹苍劲浑厚有力。

进入院内是三间不大的土坯平房，走进屋子，一种久违的山野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我们诧异地看着满屋内许多的农具，在许多农具上还注有“赵树理使用”的字，秦副校长的讲解让我们知道凡是注有字的农具都是祖父曾经用过的，甚至有的用柳条编的篮或篓也是祖父亲手所编。记得曾在书上看到或听认识祖父的人说过，祖父的手极巧，不仅干农活是把好手，好多农用篓筐都能编。也许是秦副校长让我们有了身临其境之感，特意给我们叫来郭玉恩的六儿子郭志发为我们讲解。听着郭志发深情的讲解我深深体会到了祖父与川底村、与郭玉恩之间的情感。

在1951年3月29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说，根据山西老区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山西省委决定在老区农村继续改良生产技术、推广新式农具的同时，“必须稳健地，而且是积极地提高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只有如此，才能基本上扭转涣散的趋势”。为此，经省委批准，1951年4月，长治地委在武乡县的窑上沟、东监章、西监章、枣烟、平顺县的川底，壶关县的翠谷，屯留县的东坡，襄垣县的长珍，长治县的南天村，黎城县的王家庄村，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一次去川底村，据祖父自述：“当我在1951年重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机关驻扎过的一个山村的时候，庄稼长得还像当年那样青绿，乡土饭吃起来还是那样乡土风味。只是人们的精神要比以往活跃得多，因为我们有了中央政府，老乡们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欢迎我这个回来的老熟人。”这一年川底村正被批准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长治地委试办的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由互助组转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各个方面都引起不同的思想反响。祖父就是在这个时候进的川底村，他亲自参加了建社初期的组建工作，亲自给当地农民做人社思想工作。

当年在小说没有正式出版前，《三家巷》的故事一直是在《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上连载发表的。这在当时的广州城形成了一道很独特的风景线：每天下午3点到4点左右，市民们就开始自觉地各个书亭和报摊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准备花三分钱抢购一张刚刚出版的《羊城晚报》，因为大家都急着要看《三家巷》的故事又讲述到了什么地方和人物命运又有了什么新的发展。而没有买到报纸的市民则会懊恼不已，有人甚至直接跑到《羊城晚报》总社去索要。当时广州市的广大群众对小说《三家巷》的喜爱和关注程度，可见一斑！然而事态的发展还并未结束：这部小说很快地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中国的江南北。全国各地的许多读者就是通过这部小说认识了广州，更熟悉了她的风土人情，并且迷上了《三家巷》的故事。

记得广州的《羊城晚报》特地在《花地》上编辑了一组文章，让我感到最为震撼的是关于这版特辑前面的《编者的话》：“1959年8月3日，羊城晚报‘花地’版开始连载一部叫《三家巷》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仍然坚持叙述美好的人性，并以老百姓所喜欢的传奇故事的讲法而为读者所关注，一时间，羊城晚报被广大市民所争相购买和传阅。好小说因好报纸而广为传播，好报纸因好小说而一纸风行——这也是中国报业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追述了40多年来羊城晚报和欧阳山的深情缘分。同时还让我感到颇为亲切的是陈思和教授的纪念文章《难忘〈三家巷〉》：“在我还不知小说为何物的时候就依稀听家父讲起小说《三家巷》的故事。记得那时的《羊城晚报》正在连载那部小说，家父看得津津有味，他很激动地说，他回上海探亲的路上，乘火车的旅客一路都在说《三家巷》的故事，尤其是广东来的朋友，熟悉《三家巷》的程度就好像是熟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我的原籍是番禺，却生在上海，既不会粤语也不解粤风，但这部小说的民间场景描写处处让我感到亲切，似曾回到了血缘之地。过去常听家父自得其乐地说，‘当代的广东文化有三样代表：一位是唱粤剧的红线女，一部是欧阳山的《三家巷》，还有一份老少皆宜的《羊城晚报》’”。

欧阳山也曾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延安往事：1942年的冬季，他的左联时期的好朋友也是文学青年的周而复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多年未见的老友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其中谈论得最多的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而且他们热血沸腾、踌躇满志，共同发誓要为未来的新中国每人写出一部大书来。当时谁听到这样的誓言都会以为这只是两个热血青年的心血来潮而已。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却真的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欧阳山写成了自己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诗般的五卷全书《一代风流》(全书校改后，四卷本统一命名为《三家巷》)。周而复也完成了自己描写世界反



赵树理

第二次(1952年4月)正好是川底农业社试办成功，进行扩社工作时期，农民的思想觉悟发生很大变化，异口同声地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是农民由穷变富的正确道路，很多农民报名要求入社。祖父还深有感触地写了一篇《决心到群众中去》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他诚心诚意到农村实际中去了解情况、体验生活，按照政策帮助农民办社，并通过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自己的认识。设立的制度公约是他写的，还有经济核算合理分配生产计划等等，他都亲自参与制定，一条一条写出来。

看着展厅展柜里放着那么多的各种记账条，让我好似看见祖父又在和村民们计算着收成、工分等数字，更看到祖父能为农民吃住稳妥而开心的笑脸。而那些站立的农具又似在给我讲述祖父是干农活的好把式。看着这些不知名的农具，我感到汗颜与羞愧。忍不住内心的冲动，在大家不注意时，我用手轻轻抚摸每件注过字的农具。

当年的合作社要修建水渠，川底村也有块类似三里湾中描写的“刀疤地”，1952年郭玉恩领导的农业社要开渠引水浇田，非通过它不可，而它却在贫农郭海莲名下。郭海莲的三个儿子都在外边工作，动员入社她却死活不肯，社里用好地换她这块地，她也不干。为了做通她的思想工作，祖父曾搬到她院里住，帮助她担水、扫院、推碾子，她头疼，还为她扎针抓药，终于感动了她，取得了她的信任，同意用三石谷子买一条五尺宽的地边挖渠。不料引水浇地，冲倒了她地里的几棵玉米，她便大哭大闹，抱住郭玉恩的腿寻死觅活，祖父赶来劝解，也被她大骂一顿，说哄骗了她，直到农业社高价赔偿了她的“损失”才算是了事。事后祖父笑着说，这个人财迷心窍，好不糊涂，就叫她糊涂涂吧！

赵树理写《三里湾》

□赵飞燕

还有一位叫郭过成的老党员，原是川底村最穷的人，在上改时给他分了最好的土地和牲口，入社时他就不愿意了。祖父参与了川底村召开的支部会，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愉快加入了合作社。

在祖父的帮助下，郭玉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很出色，大家选举郭建廷担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可郭建廷自知自己文化水平低有顾虑。祖父就注意从多方面培养郭建廷，先教郭建廷打算盘，从“三遍三”到“九遍九”教起，然后又教他归除乘法，郭建廷学得认真，脑子好使又虚心，很快就学会了。

农村记旧式账簿，用的十个字写法也不同，也是祖父教他的。为了使她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会计，还几次送他到长治学习。郭建廷曾对



祖父说：“我文化低，国家发的统一账簿项目太多，又和农村情况不符，不好使用。我想能用一种没印栏目的账簿使用，比较好使。”祖父听后就牢牢地记在心上。当他到长治、太原工作时专门找这种账簿买，但都没有买到。后来他回北京开会，还惦记着郭建廷想要的账簿。一天，他转悠到西西南大街，在一个叫“成文厚”的商店，终于发现了这种账簿儿，他高兴地一下子就买了30多本，寄给郭建廷，还附信说不要给我寄款。

还听到村里有老人讲，祖父在川底随身备有三种烟，有当时很流行、档次较高的“金钟”烟，价

钱便宜的“火车”烟和烟叶碾成的旱烟。祖父用这三种烟接待不同的人群。“金钟”是用于招待地区或县上干部用；“火车”是在跟社、村干部开会交谈用；而“烟叶”是用于在田间、地头与老乡们唠嗑。三种烟被村民们乐呵呵地称为是祖父的“三件宝”。

第三次去川底村是1952年秋冬。他在自述中写道：“去年1952年秋冬间，我为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曾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住了三个月。”看到临行的一张离别照片又说：“1951年虽到过川底村，但是我在这次实验中仅仅参加了建设以前的一段，在脑子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生活面貌，只好等更多参加一些实际生活再动手。于是第二年便仍到一个原来实验的老社里去参加他们的生产、分配、并社、扩社等工作，《三里湾》写作前后年底返回北京。”



1958年郭维根据《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海报

在祖父到川底不久，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来拍摄川底村试办农业社的电影，从春天种地到秋后到修水利，每个季节都要有镜头。电影厂的同志吃饭是自己起火，一天三顿细粮。他们请祖父也一起吃被婉言谢绝，祖父坚持在社员家轮流吃饭。后来他听到群众对拍电影的同志们顿顿吃细粮有反映，就向他们提出建议，后改成每天早晨吃一顿玉米面窝窝头。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同志刚刚安排就绪，中山大学学生就来这里实习，有个学生穿得太单薄，冻坏了，祖父就贴上钱给他买了家制布，做了一套棉衣，还买只鸡炖鸡

欧阳山和《三家巷》的故事

□田海蓝

法西斯战争的六部史书《长江万里图》。刘白羽同志在1989年12月“庆祝欧阳山同志从事文学创作65周年研讨会”上就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过欧阳山和他的《三家巷》(又名《一代风流》)：“他完成了一部中华民族巍巍神魄凝聚的史诗，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中一部大书，也是一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雄伟的、神圣的画卷，它有着《战争与和平》的广阔，有着《红楼梦》的旖旎”。他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大家还亲眼看见了中山大学的黄伟宗教授激动地追上台去，请求刘白羽同志将其发言稿作为自己即将出版的著作《欧阳山评传》的序言！大家还欣喜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部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小说不但多次再版，而且还被拍



成了电影、电视连续剧、舞台粤剧、小人书、连环画册，甚至还被改编成了芭蕾舞剧到北京去巡演。由此可见，人们对《三家巷》的喜爱关注程度又达到了一个历史的空前！

1978年以后，外公欧阳山重新担负起了各种繁多的社会工作，而且又开始在百忙之中着手写他的《三家巷》的后三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了。可是这后三卷欧阳山却不是自己用手写出来的：由于他的眼睛患上了白内障视网膜黄斑病变，眼睛视力几乎下降到零度，严重影响他的写作，所以不得不改为口述录音，然后由

秘书笔录下来念给他听，欧阳山再边听边修改而成的。显然这样的写作费时耗精力，所付出的辛劳远不知比正常的写作要多多少倍！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日子，我们祖孙三代人，天南地北，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大家却一直都在相互勉励和祝福着，都在只争朝夕地工作或学习着。我们全家三代人都十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或完成学习任务；还全身心地关心和支持外公的《三家巷》的创作工作，把它视为全家族的光荣。而欧阳山则更是以4年(从1981年—1985年)拿出3部小说的超常的创作热情来回报着支持他和喜爱他的广大读者们。我们都累得精疲力竭，但又累得舒心悦快，我们都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无愧于党和国家，我们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82年4月，我带着自己的毕业论文《古今



《电影画报》1982年第4期，电影《三家巷》插图

中外法，东西南北调——评欧阳山作品的语言风格”，只身南下去找外公欧阳山探讨他的文学创作。外公吃惊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的外孙女，居然会有模有样地研究起自己的作品来，而且还能够有理有据地写出一篇关于他作品语言风格的长篇大论！我也吃惊了：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的外公居然也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非常认真地听我讲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关于这篇论文的种种！我记得自己曾经很坦然地告诉外公：“我希望我能够很客观地评价您的作品。”而外公却更为坦然地回答我：“我希望你能比别人评价得



欧阳山

更为客观。”

1995年12月正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我带着刚刚写好的学术论文《艰难的磨砺》，再次来到广州参加“欧阳山《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座谈会”。关于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很多学者曾经提出过一个与作者原创意图截然相反的有趣的命题：他们都认为与主人公周炳最终结婚的不应该是胡杏而应该是何守礼。我也把这一观点告诉了在北京的外婆草明，不料她也认为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我就在广州的会议上介绍了北京学者们的这一观点。没想到的是原本非常严肃安静的场合上突然爆发出了好一阵会心的笑声，连欧阳山都在点头微笑着，并且很诙谐很理解地说：“原来还会有人是这样想的啊，当然那就是另一个版本的《三家巷》啦！”

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我喜欢用比较的方法来解读《三家巷》及欧阳山的其他作品，喜欢在组合分析中去获取新的认知与顿悟，喜欢给人物的命运以理性的合理的阐述，喜欢用逆向思维向传统定论去挑战。欧阳山从来也不先入为主地给我圈定什么框框，而是让我自己通过研究分析来认定对作品的评价和对人物的定位，哪怕是与他的创作初衷相违背也毫不介意。记得在评论《三家巷》中的何守礼这个人物时我曾经问过欧阳山：“为什么您要把她写得这么令人不喜欢？”而欧阳山却用反问的方式回答了我：“她现在不是已经被你评价得有一点可爱了吗？”我曾经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您的周炳写得也有不足之处，您写他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可是有的读者向我讲，他怎么看起来像是在模仿江姐受刑的情形，让他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欧阳山听了严肃起

汤给他喝，治好他的病。

合作社是办好了，可每天都有许多小孩子在白天因无人照顾而挨饿生病，祖父很心疼着急，他就几次同郭玉恩商量，想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在社内建立农忙托儿所，让体力好的岁数大的妇女看孩子，二是互相变工看孩子。后来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忙托儿所”就在祖父的支持下办了起来。

郭志发老人和同行老师讲述了许多祖父与川底村、与郭玉恩之间的故事，如为荒凉贫困的山村兴旺，使村民都可以过上好日子，全国劳模郭玉恩带领全村人的奋斗史；祖父如何竭尽全力，尽其所能地支持，设计工分条，与村民们一起参与秋收、开渠；又如何做好那些“翻得高”“惹不起”“吃不饱”等社员的人社思想工作。从《三里湾》原著中的三幅画与现在村庄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川底村、如今的三里湾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祖父原先住过的土屋内炕上，还摆放着祖父低头沉思写作的塑像，旁边有祖父喜爱的大鼓，墙上挂着三弦。看着屋内的陈设，我不禁感慨，身高近一米八的祖父，就睡在这短窄的土炕上。能不够、糊涂涂、一阵风、常有理、铁算盘就是在这样的写作环境下，从祖父沙沙的笔尖下走出来的！我与加藤姐姐倾听着秦副校长带有自豪和赞誉的讲解，了解祖父如何写《三里湾》的人物，村里的原型人物故事，心底的感叹使我不住鼻子酸涩。望着这带有祖父身影气息的小屋，在加藤姐姐和老师们一再呼唤声中，我久久不忍离去，惟有对着低矮土炕上祖父的塑像深深鞠了一躬。

《三里湾》出版后，祖父的老友王中青和他开玩笑说：“老赵，《三里湾》销量这么大，这次发财了吧！”祖父淡淡回应说：“你不知道，当时有三家出版社都要出这本书，我要想发财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现在送到通俗读物出版社，就是为了书的成本降一点，农民花的钱少一点，销路广一点。只要广大农民能看到这本书，我是不顾及稿费的。”他认为“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

川底村在经过63年变迁后，今天早已不是祖父与郭玉恩生活的时代了，秋收、开渠、扩社、整社，早已沉埋在记忆中，“万宝全”“惹不起”等人物，也随着时代的步伐积极投身于农村改革发展之中。川底村2011年为纪念全国劳模郭玉恩与人民作家赵树理两位对村庄发展的贡献，申请将村名“川底”改为如今的“三里湾”村。今天，为更好地发展村里的经济产业，开发旅游资源，村里建起了以吃住游为一体的“农家乐”及“三里湾剧场”，“农家乐”饭庄还把各个包间命名为《三里湾》小说里的地名，使得每个包间都含有一个生动故事。

在村庄的显著位置，耸立着郭玉恩和祖父的塑像，他们依然携手并肩，满怀深情地关注着三里湾村的今天和明天。

来，他在沉思了片刻后终于点点头说：“这位读者的这个意见提得好，尽管国民党特务对周炳也完全有可能实施了和江姐一样的酷刑，可是我自己也觉得写得不够成功，细节上有雷同的地方，而且这也不是原来小说最初拟定的构想了。因为原来在处理这个情节时是要安排写周炳在长征路上发生的故事的。我在1955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长征沿线访问团，去实地重走了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我曾经写下了厚厚的一大本资料作为小说的素材，原来是准备让周炳参加长征的。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和全部手稿连一张纸、一个字都没有留下！而现在在我的眼睛看不清了，再要想收集第一手的资料也很难了，这确实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方……”

1998年12月11日，我带着自己第一本关于对《三家巷》典型人物评论的专著《艰难的磨砺》，专程飞到广州来为外公90岁生日祝寿。外公高兴极了，虽然客厅里摆满了大家送来的鲜花和寿糕，可是外公却只把我的书专门放在客厅中央他的学生为他制作的铜像下面，而且是一有客人来，欧阳山就把他们引到铜像和书前，然后郑重其事且又十分自豪地向他们介绍道：“这是我的外孙女，中文教授，特意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当记者们采访他还有什么新的写作目标时，90岁的欧阳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要做一个跨世纪的作家！”从而让大家兴奋不已，期盼有待。但是谁也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欧阳山正在完成着一个宏大的计划：他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把构思和写作了40多年的、约150万字的五卷本《一代风流》，做一次全面的修改订正，而且这项工作早已经从1996年8月就开始了：首先是他把书名由《一代风流》改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三家巷》，而过去各个分卷的卷名就此都不再用了；其次全书总共增删1039处，光是章节段落就删去15大段，又补写了13大段，增加的字数共1552个；全书由五卷本改为四卷本。当这一切做完后，他又把修订稿直接寄到鞍山，点名要“让海蓝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毛病缺欠，帮着改一改”。在欧阳山与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从1957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初版本五卷本)第一卷《三家巷》到1999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又名《一代风流》)(校改本四卷本)前后共经历了42年，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当我们还正想着有机会要和外公一起畅谈他的新版《三家巷》时，不料2000年9月26号老人病逝的噩耗却突然传来：我们从几千里的东北鞍山赶来时，看到的只是一领凉席，几件旧衣，再有的就是他的书了！我们的外公欧阳山走了，可是他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三家巷》永远地留在了人间！“连绵风雨记征程，道德文章照后人”，这笔丰厚的红色经典的精神财富，必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而前仆后继！